

十架窄路

【附篇】

——大陸試煉烈火的亮光與見證

俞崇恩弟兄的妻子——梁尚仁醫生的見證

十架窄路【附篇】

——大陸試煉烈火的亮光與見證
俞崇恩弟兄的妻子——梁尚仁醫生的見證

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部出版、發行

需要本書請洽

中國大陸聖徒見證事工部
CCTM (Chinese Christian Testimony Ministry)

郵寄信箱: P.O. Box 292, Alhambra, CA 91802 U.S.A.

辦公室電話/傳真: Tel/Fax: (626) 281-2323

電郵: Email: cctmusa@sbcglobal.net

網址: Website: cctmweb.net

目錄

照片	i
卷首感言(俞崇恩)	ii
一、難忘的1958	1
二、斗室居住廿年	6
三、無私之愛的典範	12
四、下放郊縣青浦治療血吸蟲病	22
五、下放祁門山區採集中草藥	25
六、珍貴的患難之交	29
七、獨自去安徽軍天湖勞改營探親	37
八、文革時隔離審查	45
九、平反點滴	52
寫在後面(俞崇恩)	56



大學時代的尚仁（“梁娃兒”）

（1949年6月11日於南京丁家橋中央大學園藝場）

卷首感言

感謝主！我和尚仁結婚已整整 50 年。在這漫長的歲月裏，雖然道路坎坷，一路上卻蒙主奇妙的恩典帶領過來；如今把我們領到可安歇的水邊，我們只有俯伏敬拜這位牧養、眷顧我們一生的神。

早在 1952 年，就有同工專程來通知我：“你是一定要被捕了。”¹從此開始，一直到 1987 年第二次平反通知²，前後整整三十多年，尚仁一直和我同心、同行。特別是在我流放改造的 21 年期間，她在一位敬虔愛主的姊妹幫助下，克服重重困難，撫養兩個當時幼小的孩子，一直過著擔驚受怕、朝不保夕、恐怖、貧困的日子……。我們勞改營裏的囚徒，絕大多數都離婚了；但我們蒙主保守，實在滿心感謝主不盡。

在勞改營³裏，囚徒都是一樣的身份、一樣的待遇，不分尊卑高低，沒有彼此奚落、諷刺、挖苦或欺侮。然而尚仁是大城市著名教學醫院的醫生，卻淪為“反革命家屬”、次等公民，處處低人一頭，被人歧視冷落，“劃清

¹ 因為“三自革新”問題。

² 由上海市勞改局發出。

³ 大陸稱“農場”。

界線”；多次被批鬥、陪鬥；一再“下放”農村，受盡凌辱、欺侮、虐待。無辜的兩個女兒受牽連、受委屈、受不公平待遇，被剝奪受高等教育的機會。撒但更是趁火打劫，藉無情的政治和經濟的壓迫、前途的試探及引誘，妄圖達到破壞主的見證、致聖徒家破人亡的目的。然而神卻寶貝我們，懷抱我們直到今日(參賽 46:3-4)。祂永不背乎自己；“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”(撒下 2:30 下)。我們敬畏神，遵行神的話，不敢任意妄為，這是祂所喜悅的。

我個人在婚姻的事上，曾經十分認真、懇切地禁食禱告七次，把自己的揀選、喜好及世俗的觀念徹底撇在一邊，專一尋求神的旨意，切實遵行。我相信這是蒙主祝福、保守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在生活中，我倆學習彼此相愛、彼此尊重(彼前 3:7)，互相體貼、幫助。遇事一同商量，到主面前尋求，尊重聖經的原則和聖靈的感動；如意見相左，彼此謙讓，同時承認聖經的教訓“丈夫是妻子的頭。”有虧欠對方時，就悔改認錯，同心尊主為聖，讓基督為一家之主。

求主保守我們的晚節，效法使徒保羅的“忘記背後、努力面前”、“竭力追求”(腓 3:12-14)，“內心一天新似一天”；效法使徒約翰的“按著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裏面”(約壹 2:27-28)，不斷支取祂的恩典。

主來的日子更近了！(太 24:32-44)

iv 十架窄路【附篇】

因為那至高至上、永遠長存、名為聖者的如此說：我住在至高至聖的所在，也於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謙卑人的靈甦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甦醒。(賽 57:15)

你們要謹慎，恐怕因貪食、醉酒，並今生的思慮累住你們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；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們要時時儆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(路 21:34-36)

微肢俞崇恩

2004年8月

一、難忘的 1958

1958 年 5 月 1 日全國總動員，各地同步遵上級命令，定那天為打麻雀的日子。從那年代過來的人們誰也忘不了那是麻雀遭難的日子。當時認為麻雀吃掉糧食，定為“四害”[註 1]中的一害。孰不知大量的麻雀減少後，帶來更大的災害，使動植物生態失去平衡。在當時這是一件新鮮事，無論大人孩子都興高采烈地投入這個運動，尤其孩童們更加起勁，佈下天羅地網，房頂上、曬台上、路面上，到處鳴鑼擊鼓，敲盆打罐，響聲四起震天，麻雀拼命地飛，沒有喘息，終於疲竭落下。

當時，大家都投入到這件空前的新鮮事上，興味無窮。然而，對我家而言，那天卻是一個難忘的日子。就是崇恩接到通知，在近日內送去勞改，命令他準備行裝，隨時待發。那時，我們剛結婚四年不到，我才 30 歲出頭，他剛過 32 歲生日。崇恩是為著堅持純正的信仰，不參加三自革新而以“反革命分子”的罪名被送去勞改的。雖然他是家中的長子，父親剛去世(為主殉道)不久，他肩負著父家沉重的擔子，然而這一切都

2 十架窄路【附篇】

顧不著了——年邁的母親、年輕的妻子、幼小的孩子，還有正在求學中的弟弟們(兩個弟弟在大學、一個小弟在初中)。

就在 5 月 3 日，當我下班回到家裏，只見那桌上留下幾個字的便條，告訴我他走了。頓時，人去樓空的悲哀襲上心頭，我撲在桌上大哭一場，好像活生生地把一個人撕裂，心裏的傷痛無法描述。

可是我深深地知道，環境不允許我花過多時間沉浸在悲思中。我求主加給我夠用的力量，因為我還要正常地上下班，處理我的業務，還不能讓同事們看出我內心世界，家裏一攤的難處還要安排。我好幾晚徹夜未眠，因吃不下、睡不著，人很快地消瘦了。同事們還以為我病了(我年輕時身體十分健壯，幾乎不請病假)。就是這樣，我也硬挺了過來[註 2]。若不是主的厚恩，我怎能承受得了？

大約兩個月不到(因 7 月 3 日出發)，我接到看守所的通知，要接見家屬，我可以帶給崇恩一些日用品等。這意味著他們要離開上海了。

那天早晨，我抱著兩歲不到的大女兒路備(小女兒才五個月，未去)，耀弟(崇恩的小弟)才 12

歲，扛著一隻箱子，母親拎著包，一同準時抵達郊區橫濱橋路 723 號收容所。看望的家屬很多，被看望的人坐在一大操場裏一排排的長凳上。

在眾多的人中，我們找到了崇恩。兩個月的功夫，他就憔悴了許多。我們兩歲的孩子懵懵懂懂，她怎麼也不能領會到這就是與父親的別離。

崇恩告訴母親和我：“不要難過，頂多三個月，就可返家。是勞教，而不是勞改判刑有刑期。”

他這樣安慰我們，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多少日子。忽然間吹哨子了！集合了，家屬都必須離開場地。萬萬想不到，他這一去就是 21 年零 7 個月。

崇恩他們 7 月 3 日起程，坐的是不通風的悶葫蘆貨車(運牲口的火車車廂)。天氣十分炎熱，又經過長途汽車、小木船及步行，路途很艱難，7 月 6 日才最後到達閩北近乎原始森林[註 3]的山區，開始勞動改造[註 4]。

我每月要寄給他一封保價信，內裝 16 元人民幣[註 5]。當時和我同在一個醫院裏的護士張素娥[註 6]，她丈夫李摩西也是因著信仰而送到福建改造的，但與崇恩不在一個分場。張姊妹很愛主，

4 十架窄路【附篇】

也很堅強。他們有兩個年幼的男孩，全院只有我們兩個人處於這種同病相憐的光景。禮拜天我常去她家，和她一起禱告，把我們心中的痛苦和重擔卸在主面前，就覺得輕省多了。

我倆也常一同籌劃給各自的丈夫寄些什麼可充饑的食物，常自己省下糧票，買麵粉或壓縮餅乾。麵粉經炒過，拌上糖及豬油，再放在餅乾筒裏寄出。每寄一次，我們兩個都要花很多時間包裝，還要尋找合適的郵局等。我倆都是靠著自己微薄的工資來支撐著家庭。

張素娥姊妹有個很愛主的婆婆扶持，為她禱告，做她的後盾，替她負擔了一個孩子(與祖母、姑姑住在一起)的生活、教育費用，直到 1962 年李摩西弟兄身患重病，保外就醫。

李弟兄接回家來後，住進我們工作的上海第一醫科大學附屬華山醫院，經檢查，診斷為“血癌”。病情每況愈下；病危期間，素娥除了本病室的護理工作，還要一有空隙就去護理摩西弟兄，做各種檢查。檢查地點若在另外的科室，她就親自背著他去，不麻煩別的護工。她關照醫生，盡量用好藥、進口藥、輸血。儘管這樣積極地治療，只兩個月的功夫，李摩西弟兄就被主接

去了。

素娥面對這樣的情況，並未落在過度的悲痛中。她堅強地靠主活著，省吃儉用，所欠醫院的一筆可觀的醫療費，都從她的工資裏逐月扣去，不申請減免補助，一切都做得光明磊落。在神面前、在人面前，存無虧的良心，榮耀主名。

如今，她早已退休，也七十出頭了，還常定期探望老人院的弟兄姊妹，給他們一些醫療上的幫助。我很敬重她。

在醫院裏，我很怕開小組會。會前大家環坐一起，總不免閒聊一些家事，譬如張三告訴李四：“昨天我過生日，我愛人送我什麼……”李四告訴王五：“我愛人帶我們到哪裏去遊玩或幫我做了一件令我愉快的事”等等。大家輪著，談笑風生，但是一到我的當口，就默然無言。當然同事們的沉默，一面是一種同情，另一面也是一種無奈。然而在我的心裏，卻是一種錐心般的傷痛。

幾十個“三個月”的光陰都已過去，崇恩還沒有回來的影兒，盼望也就破滅了。隨著年日流逝，也沖淡了一切，也可以說習以為常，也可以說對一切的遭遇已麻木了。繁忙的醫、教、研，

6 十架窄路【附篇】

佔據了我整個心思，每天要面對這些安排好的程序。年歲逐年增長，人也老成了些，在後來平穩漫長的一段生活中，只學習了一個功課，就是一日的難處一日當，不要為明日憂慮。……(太 6:34)

[註 1] 老鼠、蚊子、蒼蠅、麻雀。

[註 2] 那時兩個孩子寄養在蘇州，另有記述。

[註 3] 在那裏的生活、工作，在<十架窄路>中有記載。

[註 4] 那個農場名叫“上海市勞改局閩北(勞教)農場坑塘分場”；當時上海勞改局所屬散佈在全國艱苦地區的勞改農場共有 21 個，規模大的有五萬人，小的兩萬人。

[註 5] 郵局規定不得超過 16 元。

[註 6] 見本書所附照片頁。

二、斗室居住 20 年

我公公俞成華過世前後，我們在上海膠州路租的房子，一樓、二樓均為俞家居住，一樓客廳設有眼科診療室，二樓住人。二樓共有一大間正式臥室及兩個亭子間，還有一個搭在弄堂底(無人走動的一角)的二層小庇(違章建築)[註 7]。

那時，我剛從醫學院畢業，還是低年住院醫生，多半住在醫院，吃在食堂。我們結婚後也無一正式居所(那時崇恩在蘇州第一中學教書)。

1956-1958 年這個階段，家中發生了巨大的變

化。崇恩的三弟崇義及四弟崇架尚在北京的大學裏求學，小弟崇耀年幼，婆婆帶著他暫住在大姐崇愛家。崇恩送去勞改，二弟崇信由於大學期間在校傳福音，被劃為右派，從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畢業後，分配在舟山島上做醫生。

膠州路居所只剩下我一人進出。正逢大煉鋼鐵[註 7]的年代，我常常半夜三更摸索著回到家中，趕快關門，匆匆忙忙上到小亭子間，才喘一口氣，得到安息，好像鳥兒回到巢裏，享受一點安全感。第二天一大早又三步併作兩步地趕到醫院，做些非醫療性的體力活。

這樣的日子並未過多久，里弄幹部就看上了我們樓下的空房，強逼我們在規定的期限內騰出來上交(租房多餘都要上交)。我和家人商量，由於我們是“反革命”成份，毫無申訴的餘地，加上里弄催得緊迫，我們就把客廳裏所有的傢俱，三錢不值兩錢地廉價處理，也可以說半送半賣。一時處理不了的，只好集中在二樓較大的一間臥室內。放眼科醫療器械的櫃子，只得擺在小天井裏，任它日曬雨淋。

我一人獨出獨進過著早出夜歸的生活。就在這樣天翻地覆的變遷之中，也不能在醫院裏稍稍

表露出一點家中悲慘情況的蛛絲馬跡。夜深人靜時，常將悲痛的淚水往肚子裏嚥。……

那時科內還並不瞭解我(丈夫在改造)的情況，也給我一個深造進修的機會，派我到普外科進修三個月。原本這麼一個學習的好機會，我應抓緊時機，不但在查房、手術上多操練基本功，也可在外科理論上多讀書充實自己。然而，在這惡劣的環境中和傷痛的心情裏，哪來這份上進的動力？因此，三個月下來，收獲甚微，實在太可惜了！

1959年的暑假，四弟崇架從北京師範大學畢業，奇蹟般地分配回上海工作(當時北京至上海的分配名額只有一個)，這樣，婆婆便帶著耀弟又回到膠州路來住。

那時，樓下(一樓)已經搬來一戶多子女的家庭，不但孩童吵鬧，也毫不講理地爭奪地盤。他們是所謂的工人階級，我家卻是被監視的專政對象，我們只得處處讓他們三分。

婆婆和兩個弟弟回家，清理大房間，安頓下來；我被安排在小亭子間(6平方米)。家中人多了，我就不覺得那麼懼怕、孤單了，情緒上也安定一些。然而好景不長，婆婆和我談起，說兩個

弟弟漸大，崇架也要準備結婚了，耀弟也成人了，不能三個人再住在一大間內，要我住進違章的小庇裏，亭子間讓給耀弟。

實際情況擺在眼前，我無奈，只得搬入這間小屋(一共只有 8 平方米)。房門高只有 1.3 米，必須低頭哈腰才能進門，再下三個台階才能進入(我從小到大，從未住過如此狹小簡陋的違章建築)。室內高 2 米，牆壁的厚度只有正規牆的一半。除了西曬太陽的小窗外，還有半扇靠近屋頂的南窗，位置超過身高，加上對面弄堂房子擋住視線，室內無法看到戶外。靠天井的門縫要用紙糊起來，冬天用破棉絮堵塞。真可說是冬寒夏曬，比大房間溫度相差 2-3 度。又加上一個大型古董箱子[註 9]佔據了房間的三分之一。當大女兒路備尚未從蘇州遷來上海讀小學時，我一個人放一張單人小床及一個破舊的黑色五斗櫃，就將這僅剩下的 5 平方米的地面佔滿了。後來路備來滬上學了，我只得把這隻大型箱子當她的床用。她每早起來，大箱子面上就出現一個人(汗氣)印。後來路備漸漸長大，不適宜再睡在那個箱面上了，婆婆忍痛將它賣掉(因為婆婆可放許多東西在內)，這樣我和路備才開始各自有了自己的單人床

位。

不久，走道的閣樓要裝煤氣了，我真是一面欣喜一面愁。欣喜的是不用再生煤球爐了；憂愁的是煤氣的油煙、熱氣都要從那扇 1.3 米的小門進入。

1969 年，崇耀也結婚了，這間走道亭子間共裝了三家煤氣灶(婆婆與崇架及其女兒爲一戶；崇耀、文秀一戶，我和路備一戶)，可想而知這個熱量增加了多少！我這個小斗室冬天還可勉強度過，只要多蓋幾層棉被；可是夏天房頂牆壁均甚薄，西窗直射，亭子間三個煤氣灶熱氣直燻，使我熱得透不過氣來。雖然白天醫院工作忙碌，回家來已十分疲乏，但仍熱得無法入睡，只得坐著小凳子，在浴室旁享受一點穿堂風。那時我們沒有條件買電風扇，大房間門邊比較涼快些，崇耀一家早佔席位。就這樣，夏去冬來，年復一年，煎熬度過 20 年。

當大女兒路備 6 歲來上海讀小學後，我因著做母親的強烈責任感，下班後急著回家照料她。她還在蘇州時或假期她回蘇州後，我天天下班拖著疲憊的腳步，並不想回家，那兒沒有絲毫吸引我的地方。我有時在街上小攤位上吃點粗湯麵、

蔥油餅，解決了晚飯才回家。

這樣的居所，我無法帶任何朋友同事來作客。有一次，我大學裏的同學張愈昭從海南島來滬，特地來看我。幾十年未見，她一鑽進我的住房就說：

“梁娃兒[註 10]，你怎麼住在這麼個鬼地方！”

雖然醫院領導上多次要改善我的居住條件，然而因為我的丈夫是“反革命”就不予考慮，我也只有“默然不語”(參詩 39:9)。

直到 1978 年底，誰也不知道崇恩會回到上海，神卻知道。就在上海房屋十分緊張[註 11]、根本不可能分配到房子的情況下，奇妙地安排了長樂路 655 號，後又分配到華亭路 17 甲 301 室[註 12]。

神知道人都是不可靠的，都是虛謊(羅 3:4)、詭詐(耶 17:9)的，又加上撒但如吼叫的獅子，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(參來 7:25)；我的光景，我自己很清楚，自知十分軟弱敗壞。多少次外界的誘惑稱讚，撒但的欺騙，使我陷入痛苦的思想鬥爭中。爲了孩子們和我個人的前途，我也曾試圖說服自己(離婚)。但感謝保守我到底(參來 7:25)

的天父！聖靈在我深處就是通不過、不允許、不平安，反而更加痛苦。祂藉著多年不改善我的居住條件，讓我在婆婆的保護下，共同在一個屋檐下居住了 20 年，是神美好的心意、奇妙的安排，使我深深經歷到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，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(參賽 55:8-9)。感謝神奇妙的恩典保守了我，並不是我比別人強(參腓 2:3)。

[註 7] 見本書所附插圖及<十架窄路>插圖。

[註 8] 當時(1959 年)，毛主席號召“全民煉鋼”；由於缺乏技術、原料，結果大傷元氣，得不償失，只好半途而廢。

[註 9] 該箱子長 2.5 米，寬 1.5 米，高 1 米；從前京劇演員可將長袍勿需摺疊地平放在內。

[註 10] “梁娃兒”是大學同學時的昵稱。

[註 11] 解放三十年(1949-1979)，上海市內沒有建造過民房；人口大增，住房的擁擠可想而知。

[註 12] 這些神蹟在<十架窄路>裏均有詳細記載。

三、無私之愛的典範

我每思想在我一生當中經受極大艱難時，俗語說真是萬般無奈、走投無路時，神藉著她——朱惠銘姐妹[註 13]——給我帶來幫助、安慰和力量。回想這段歷程，我就肅然起敬，俯伏敬拜愛我的神。

那是 1958 年 5 月初，我丈夫由於要堅持聖經

真理、尊主爲大、拒絕參加三自，被送去勞動教養。那時我 30 歲，大女兒路備不滿兩歲，小女兒心備剛 5 個月。原先這兩個孩子寄養在蘇州孫師母朱惠銘姐妹家。孫師母自己沒有孩子，且丈夫早已去世；她很愛這兩個孩子。她精心地照料她們，爲使我在上海工作得以安心。

由於我的家庭突然發生這樣巨大的變化，經濟力量驟然下降，我爲了節約開支、精打細算，就準備將兩個孩子接回上海，放在醫院辦的托兒所裏。當我到蘇州和孫師母商量這件事時，她執意再三不肯將孩子讓我領回。

她說：“梁醫生(她一直這樣稱呼我)，俞弟兄是爲主擺上的。這副擔子你一人挑太重，我和你一起扛。你只要給我最低的開支費用就可以了。……”

那時期，我一個人的工資要分三處開銷：一份寄丈夫，一份寄蘇州，一份我自己。聽了她這一番真誠慈愛的話(參創 50:21)，我真是感動得淚流滿面，說不出話來。在那個時候，眾人都遠離我，要和我劃清界線；而在這個當口，神卻藉著孫師母這顆從基督裏所發出的愛心——無私的愛——給我同情，給我幫助，給我力量。這是多麼

大的扶持啊！她不顧自己的安危和被里弄幹部的輕看[註 14]，忠心地爲主名而擺上。

當崇恩剛離家不久，她帶著我們幼小的兩個孩子從蘇州到上海膠州路家中，陪我住了兩個月左右，給我很大的安慰，孩子們也帶給我一些歡樂。

不久，四弟崇架從北京師大畢業，分配到上海來工作。婆婆和小弟崇耀都由姐姐崇愛家遷回膠州路來，我一人就被安置在一間小亭子間(6 平方米)。

由於孩子們和我對孫師母十分愛戴，就稱呼她“婆阿”[註 15]。那時婆阿不過 45 歲。她雖然未曾上過學，讀書少，沒文化，信主後才慢慢學會讀聖經)。但她卻有一顆敬畏主、愛主的心，也是一位善治理、會安排、手巧心靈的家庭主婦——少花錢，多辦事，用不多的錢讓孩子們吃得很有營養。她自己不捨得吃雞蛋，卻保證每個孩子每天半隻蛋(一隻蛋兩人分)。那時，每個人的糧、油、肉、糖、蛋、布等，都是定量憑票供應。她是個家庭婦女，孩子們幼小，都屬於低定量標準[註 16]，她每月還要省下一點糧食給孩子們買些餅乾當點心，自己卻長期處於半饑半飽的

狀態。

有一次節日，我去蘇州看望她們。鄰居告訴我，婆阿有一回出去買米，暈倒在路上。但這事婆阿從來沒有告訴過我。到吃飯時，她自己吃一點連湯帶水的泡飯，卻總是盛滿滿一碗乾飯給我吃，又把好菜放在我面前。[註 17]

每當孩子病了，例如患扁桃腺炎發高燒，她就抱一個、牽一個，去聯合診所看病打針(兩個孩子幼小，很易交叉感染)。孩子發高熱時，她常裹衣連夜守護在旁，直到孩子燒退了，病好了，她才託人帶信給我。她十分愛我、體貼我，惟恐我心急，影響身體及工作。

每逢過春節，她總要從牙縫裏省下一點錢，買點彩色線，給孩子們鉤(用鉤針編結)頂法國式帽子、做件新花布罩衫。我在上海將我一個人的票證所能買到的年貨，點點滴滴都省下來，如魚、雞、蛋等雜貨(這些是平常吃不到的)；再買些糖果糕點，也讓孩子們感到和別人家的孩子一樣——有好吃的，有新衣穿，歡歡喜喜過大年。然而，我們樓上的房東家，卻是兒孫滿堂大團圓吃年夜飯。

有一次，小女兒心備自言自語地(用蘇州口音)

說：“人家的爸爸一直來，我的爸爸一直不來。”雖然她爸爸離開時，她才 5 個月，還沒有記憶，不知道她爸爸是什麼模樣。這時，她已兩三歲，對於父母這種天然的親情油然而生；每當看到別人家天倫之樂，她就會聯想了。也許婆阿平時也向她們講到她們的父母親。

婆阿是一位十分懂得親情而又有藝術感的人。過年過節的上午，她在家燒菜，給我們準備美餐，就讓我把她精心打扮好的兩隻美麗的“花朵”，帶到附近公園去玩。她們倆在草地上盡情地拍球，追趕著玩。

我獨自坐在大石頭上注視著她們，欣賞著她們的一舉一動。而小女兒昨晚自言自語的那句話，卻一直在我耳邊迴響，使我沉思，眼淚往肚裏流。我不能讓孩子們看見我流淚；我還要強顏歡笑，把喜樂帶給她們。

每當假日結束，我坐著那悶葫蘆加班車回滬時，一切的歡樂全消失在痛苦中。

孩子們漸漸長大，消費也隨著增加。我寄去的家用費已入不敷出。婆阿不把困難告訴我；她自己禱告，求主幫助，就到附近加工廠領回一批加工活，叫“外包工”，如在毛衣上繡朵花、鉤

邊、釘鈕扣、鉸鈕洞、收線頭等(計件工)。白天要做飯、洗衣、(井裏)提水等家務事，晚上用老式滑輪(從天花板上)拉下一隻 5 瓦的小燈泡，在昏暗的燈光下做活，經常做到深更半夜，就是這樣賺一點點小錢，貼補家用。

我大女兒路備從小看著婆阿做手工，跟著婆阿學，因此 4-5 歲就會繡花、織襪子了。後來到了 6 歲，回到上海進小學。她想像力出眾，到二、三年級時，創作出來的畫就刊登在<小朋友>雜誌上。如今她成功地學會了壓花技術，作品在美國、日本、英國都展覽過。這些藝術成就，與婆阿對她從小的教導和燻陶，都是分不開的。婆阿就是她的啓蒙老師。

路備在上海讀書時，每逢寒暑假一定要去蘇州度假。她愛蘇州，更愛婆阿。她一跨進蘇州家的大門，就手舞足蹈，快活極了。婆阿告訴我，路備一翻日曆，見快開學了，就開始憂慮了，勉強地回到上海，期待著下一個假期的來臨。

有一次，婆阿身體不好，懷疑有子宮腫瘤，需要住院檢查。那時大女兒 3 歲不到，大小便可呼人幫助；小女兒剛摸著牆學走路。婆阿住院幾天了，兩個幼小的孩子交給一位當時已 70 多歲的

小腳孫老奶奶[註 18]照顧。

當我知道這個情況後，立即從上海乘快車趕到蘇州。我先到醫院看望婆阿，然後回到泗井巷家中，把大女兒留給孫老奶奶照顧，把小女兒帶回上海。我白天要上班，膠州路居所除我以外，再無他人，只好把小女兒心備放在山西北路崇愛姐家[註 19]。

心備看到全是陌生人，她就一整天不吃也不喝，只是不停地哭啼，從這個房間沿著牆壁摸到另一房間，只盼望能找到一個她所認識的人。

我在醫院裏工作，心緊緊地掛著她，一下班就馬不停蹄地踏上 15 路公車，趕到崇愛姐家。看到女兒疲憊可憐的模樣，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此時又是炎夏，孩子滴水不進，不是要生病嗎？我實在走投無路，默默求主為我開路。

感謝主！祂垂聽我暗中的呼求。就在此刻，有一位夏桂芬姐妹來崇愛姐家看望我婆婆。我們全家人就將我們的難處和她商量，她一口答應，樂意去蘇州短期照顧一下婆阿和兩個孩子。這樣定妥後，我當晚就把桂芬姐妹和小女兒送回蘇州。

此時婆阿已出院，病理切片未見癌細胞，但

身體甚為虛弱。小女兒一踏進泗井巷大門，那種歡天喜地的模樣，簡直無法形容，連連呼叫“婆阿！婆阿！”婆阿高興得熱淚盈眶。我因次日還要上班，連夜乘火車返回上海。

我真感謝神！每當我無路可走、四面楚歌時，祂就伸出大能的膀臂，幫助我渡過難關。桂芬照顧她們一個多月，直到婆阿康復才回滬。

最使婆阿作難的就是怎樣解決孩子們心中的苦惱。我頂記得當小女兒唸小學時，作文要寫“家史”。每當寫到父親，她就不知怎麼寫，哭哭鬧鬧，使婆阿不得安寧。婆阿沒有文化，也不知如何幫助她，只得和她同悲同憂。本來小女兒在班上“三好”學生，但自從家史暴露，老師、同學對她都另眼看待，使她在各方面一落千丈，小小心靈極其痛苦。她生性好強、愛面子，從此她不敢也不願交朋友，性格變得孤僻、自卑。我幾乎沒有看見她帶同學到家中來玩過。

婆阿常在應急處理一些消費時，把她自己稍微值錢的一點東西賣掉補貼家用，渡過難關——如小女兒初中畢業分配到農村，要買箱子、添置用品。她從不將難處告訴我，總是把困難留給自己。

婆阿真是一位十分聰明的人，也是一位編織絨線的能手。她心靈手巧，看什麼花樣，一學就會。她這門技術不但幫補家用有貢獻，她還給我和孩子們也編織了好幾件各式花樣的毛衣。她手工精湛，人見人誇。如今，我每穿上她替我織的毛衣，都要細細地欣賞許久才穿上；那針針線線裏都編織著她深厚的愛。

直到崇恩 1979 年回家，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書(1984 年平反)後，我們的日子才有了改善，婆阿也才開始過上舒坦快樂的日子。〈詩篇〉中一句話常摸著她的裏面，對她說話：“神叫孤獨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來享福……”(詩 68:6)。小女兒心備 1984 年結婚後，婆阿就一直和這個小家庭生活在一起，心備就開始照顧、奉養她的晚年生活。

孩子們長大成家，對婆阿十分敬愛。自從大女兒路備一家來美後，只要知道婆阿需要什麼日用品或營養品，凡是能買到的，總要讓她老人家享用。路備對心備說：“我出錢，你出力，讓婆阿的晚年生活過得幸福美滿。”後來婆阿走路不便，路備從美國特地買了助行杖(walker)託人帶給她。

1990年，我第一次回國探親、看病檢查。婆阿老人家已70多歲高齡，特地早幾天從蘇州趕到上海，陪我住了幾個月；想不到這竟是我們最後一次相聚。回顧那段日子，她天天默默擺上無微不至的愛，讓我細嚼甘甜，終身沒齒難忘。

2000年7月16日，婆阿長辭人世，安息主懷。在蘇州，眾多的弟兄姐妹懷念她，舉辦了隆重的追思禮拜。我大女婿智生哀誦悼詞，眾人都流著淚與遺體告別。然而到那日我們要再相聚，永不分離。我和崇恩滿懷敬意地寫下“無私之愛的典範——我們敬愛的婆阿安息主懷”一文，傳真至蘇州；我們和孩子們的名字都列在花圈的飄帶上，深深地悼念她老人家。這幾個醒目的紅字就篆刻在她的墓碑上。小女兒的一家每逢假日，就捧著鮮花去婆阿的墓前掃墓，懷念她老人家對他們深厚的恩愛。

[註13] 見本書所附照片頁。

[註14] 婆阿本人由於丈夫是地主，她承受的政治壓力已經是夠大的了。

[註15] 這是蘇州人對奶奶、外婆的愛稱。

[註16] 我們有工作單位上班的人及鋼鐵工人定量就會高一些。

[註17] 在那個年代，能飽餐一頓可口的飯菜就是一種享受。

[註18] 她當時和婆阿住在一起。

[註19] 當時我婆婆和耀弟均暫住於此，離我住處膠州路有半小時公車路程。

[註 20] 夏桂芬和我婆婆是同鄉，而且曾在婆婆家做過媒姆。

四、下放郊縣青浦治療血吸蟲病

1959 年，我科分配來一位北醫畢業的口腔科女大夫——郝以明大夫，是一位中共黨員。漸漸地，她對科內每個人的檔案都有所掌握，就開始對李學祥主任和我另眼看待。她知道李醫生有參加過(前國民黨)三青團的政治歷史問題；我是基督徒，丈夫在改造；其他科內醫生都是可團結的對象，如華僑、共(產主義)青(年)團員等。因此，她處處挑剔李醫生和我，給我們施加壓力，打小報告等，在工作上也百般刁難，使我們無容身之地。

直到現在，我還不明白當初為何要派我去青浦治療血吸蟲病。我是口腔科醫生，即不是內科醫生，更未從事過流行病學研究，對這方面毫無經驗，豈不是濫竽充數嗎？我雖然不解，還是服從領導上的安排，因為在我的深處十分清楚，祂的兒女所遭遇的一切，都在祂的掌握之中，遲早會顯出祂的美意(參羅 8:28)。

到了青浦，我和一批上海醫科大學的實習生配搭在一起，從事醫療工作。我們分成若干治療

點，每一個點有 20-30 個病人，已安排有低年內科醫生蹲點(留守)，再加上幾位實習醫生助理。

我蹲點在大隊部。治療點有什麼事情發生，都要打電話到大隊部請示。我是外行，實際上並不比他們高明多少，所以每天恐懼戰兢，就怕銻劑靜脈注射後產生“阿斯綜合症”。我對這方面的搶救缺乏經驗，也缺少能力，天天活在緊緊依靠主中。

也感謝主！每星期一從上醫大附屬中山或華山各醫院輪流安排內科教授、傳染病科專家來巡視查房，如林兆耆院長、徐肇玥(女)、謝淑貞(女)等教授，帶大家查病房、聽講座。這段期間也使我在內科業務上有所收獲。

可是最使我感到孤單無助的，就是當週間這些專家不在時，我就會膽戰心驚，特別是在晚上，我一個人睡在樓上一間有 30 個空床鋪的大房間內[註 21]，選了靠窗口的一張鋪位。鄉間的房子結構較差，上樓、下樓、刮風都會有吱吱喳喳的聲音，真令人害怕。我何其盼望徐教授或謝教授能來巡視查房，也可陪我住上一夜。我每天都活在各種壓力下：一種是業務上的生疏、外行、不能勝任；一種是生活上的孤單、無助、恐懼，

簡直有度日如年之感。

在青浦我最難忘的一樁事：一天凌晨，另一病區有緊急情況，要大隊部醫生趕快前往搶救。當時，大隊部除我以外，還有幾位男實習醫生。其中一位叫鄭安琪，他身體魁梧高大，是摩托車能手，曾在越野比賽中得過名次。他帶我坐在他的摩托車後面，緊緊握住把手。我心中十分膽怯、害怕、空虛，沒有把握，實在沒有搶救併發症的經驗，只有默默地求告主：“你知道我的實底，不要將難當的擔子給我(參腓 4:6-7)。我的面子失去倒還事小，若給患者帶來延誤和危險，那就糟了。”就是這樣，無依無靠地交託給主(參詩 37:5)。

摩托車經過的路上，由於鄉下人很少見過這樣的車子，該讓路時不讓，不該讓時卻讓。忽然小鄭一個急剎車，把我一下子拋出幾丈遠。幸虧主奇妙的保守，路旁有棵百年大樹，不然我一定會滾到河裏去了。就是這樣，也跌得鼻青眼腫，但主差使者保護，沒有骨折或腦震蕩(詩 91:11)。

這一下把小鄭嚇壞了，不知我傷勢如何？由於我這一耽擱，在病區的管理醫生陳允(內科低年醫生)，帶領其他醫護人員，與當地的赤腳醫生配

合，共同搶救處理，使病人很快轉危爲安，免去了我臨場手足失措、導致意外事故的可能性。這是主的拯救，實在感謝讚美主！

我在青浦的幾個月所從事的，不是自己本專業的工作，成天擔驚受怕。感謝神的憐憫、保守，帶領我過來。

回到華山醫院後不久，那位郝大夫先被調到華東醫院，後又到二醫了。她擅長教學，有豐富的牙周病、粘膜病教學經驗。待文革結束後，有一位下放青浦的外科高年主治醫師潘祖德[註 22]大夫告訴我：

“梁醫生，你當年也是在下放青浦縣醫院‘黑名單’中的一名。”

根據當時的形勢，此事似乎必然臨到我。然而神不允許(詩 103:19)，也會陰差陽錯地把我的名字從‘黑名單’上挪去；否則，對我兩個幼小孩子的關懷與照料，又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困難了。

[註 21] 雙搶(搶收早稻、搶插晚稻)或有其它任務時，這裏有女同學來住。

[註 22] 已移民美國，現在北加州。

五、下放祁門山區採集中草藥

1971年夏季，文革(1966-1976)進入高潮。我院是醫務界緊跟形勢的“急先鋒”，醫院裏派出五個人去安徽祁門山區採集中草藥。三男二女，男士是皮膚科的秦萬章醫生(對中西醫結合有研究)，是我們的隊長；一位是藥劑師沈江淵，一位是工人馮根發。女士一位是護士奚隸芳(對中藥、針灸甚是有興趣和研究)，一位就是我。我是其中年齡最長者，43歲，其他四位均不滿40歲。

一路上，我們乘著敞蓬大卡車，驕陽似火，熱浪難當。到達祁門的第二天就投入任務，上山採中草藥。遍山樹林草叢，沒有路徑，是靠著兩手抓著草藤往上爬行。我爬了一點路程，就感到心慌頭暈，實在吃不消，只得退伍，獨自滑坐山下。

我站立在山腳，抬頭仰望，看這陡峭的高山，不禁生發畏懼之心。我默默禱告：“主啊，這樣艱巨的採藥任務，我怎能完成？然而在你沒有難成的事。”

此時我已患有高血壓病，登高本來是高血壓所禁忌的，可我作為一個反革命家屬，怎能逃避呢？

我每早晨出去，都是一面禱告求主加給我力

量，一面自己努力克服重重困難。看著別人如何一手抓草攀樹往上爬，我也模仿著如此爬。頭一個月真是辛苦，後來慢慢地熟練起來。

回到住處(祁門縣立醫院)，還要將採來的成捆的草藥運到河邊洗淨，再曬乾、切碎、煎、熬、濃縮、過濾、消毒，用土法製成針劑，供上海臨床試用。

就這樣，我們在祁門縣山區採藥，並在縣醫院蹲點製藥。偶爾我也就我的技術(口腔科方面)做點小小的服務(因為此醫院沒有口腔科)，頗得群眾歡迎。

這樣的生活逐漸走上軌道，但上級又命令我們到深山冷壑更偏僻的鄉村去採集草藥；不但山高林深，採藥更艱苦，生活條件也更差。

我和小奚(護士)住在一間四面透風的小茅屋內，男士們住在樓下。上樓要走一個很陡的梯子，四面通風，又無電燈。夜裏如上廁所，就是大困難。農村的廁所就是一個草棚子，無門，下面一口大缸，缸上放兩塊木板，蠅蛆滿佈，簡直無法下腳。這就是我在農村最感痛苦的事。

在這裏採藥往往要進入山林深處，有的地方樹林密集，本地人告訴我們要小心毒蛇的攻擊。

祁門是有名的產蛇之地，有五步龍、竹葉青、大眼睛(均為蛇名).....，因此採藥時還要時刻警惕著，向四面八方張望，以防被蛇咬著。毒蛇咬著會致命的，所以真是膽戰心驚，時時依靠主的保守看顧。祁門山區蚊子特多，所以每個人都必須掛蚊帳。聽說曾有人晚上回到房間，打開帳子準備睡覺，竟看見一條五步長蛇盤坐床的中央，真是可怕極了！山區裏常有狼、狐狸、野豬等出沒，所以我們進到山裏都要成群結隊不分開，恐怕野獸的攻擊騷擾。

我天天要向主禱告：“不要讓我們遇見試探，救我們脫離兇惡”(太 6:13)。

有一天(大概是在 1971 年的 9 月份)，這天氣氛十分恐怖，到處都有解放軍站崗。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直到中午我們採藥小組接到上海醫院來電，命令我們立即返滬。待到達上海，才知共產黨內竟發生了如此驚天動地的政變[註 23]。在上海連續開了好幾次大會及分組討論。事後，據說像這樣的大會，我(作為反革命家屬)是沒有資格參加的。若將我一人留在農村，孤零零的很不放心，只得免為其難地帶回上海。

在那個年代，我們這群人真像“糞缸裏的蜜

棗”（家鄉土話）——處理掉吧，沒有充足的理由；何況在醫院服務多年，還要派你用場。不處理吧，放在人民隊伍裏，又是千百萬個不信任，要貶低你、歧視你、誣衊你，使你感到生不如死。難怪有一些比我還要年長一輩的老知識份子、老教授、老專家（少數為國寶），他們畢生的精力都貢獻在他們的事業上，實在忍受不了人格上的侮辱和摧殘，最後選擇了“寧為玉碎、不為瓦全”的絕路。何等淒慘！給國家造成多麼大的損失！真是不堪回首。

對我這個軟弱不配的基督徒來說，或許親身體會到了一點什麼叫作保羅所說的“世上的污穢，萬物中的渣滓”（林前 4:13）、“世界上不配有的人”（來 11:38 下）。

[註 23] 指“林彪反黨集團”事件：以林彪為首的陰謀顛覆人民政府的反革命集團。1971 年 9 月 8 日陰謀敗露後，林彪夫婦及兒子於 9 月 13 日私乘飛機外逃，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。[詳見<詞源>上海辭書出版社]

六、珍貴的患難之交

三十多年過去了。回想起來，點點滴滴仍不能從我的記憶中抹去。因為環境太惡劣了，人與人之間就是猜疑、鬥爭（勾心鬥角）。我當時處於

“反革命家屬”地位，凡事低人一等，是所謂的“敵我矛盾”成份。周圍的人明哲保身，都要和我劃清界線，生怕沾染上“大痲瘋”；即使平常相當要好的同事、下級醫生等，此時此刻也不敢理睬我了。群眾大會我沒有資格參加；慶祝、娛樂活動與我無份，甚至主內的弟兄姐妹相遇，也只能以目光示意，無言而語。

我深深地感到主的話是那樣地千真萬確：“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的手下”（約壹 5:19）。

當時最使我快慰的事，就是和病員接觸。給他們看病，談上幾句，也覺得很痛快，因為有個說話之處。尤其是他們的病得到醫治，回頭來表示感激，更使我得到欣慰。

就在和病友的診病過程中，神將許多心地善良的好人賜給我。他們不但信任我，還愛護我。我惟恐連累她們[註 24]，當她們執意要和我交朋友時，我總是把我的狀況透露給她們，可是她們非但不輕看我，反而更加顯出尊敬和同情。

在我心坎中最不能忘懷的有好幾位：

一、俞嶺梅[註 25]：她是一位小學教師，當時 50 多歲，丈夫是資方代理。她十分信任我的醫療質量，不但帶兒輩、孫輩來求治，甚至還有遠

方來的親友。久而久之，我們成了十分知己的好朋友。她家距我院甚近；她擅長烹調，一有好吃的，就特地邀請我去她家吃飯。

記得有一個禮拜天，她和小孫女涉水[註 26]來到膠州路我的住處。她們捧著一個鋼筋(鋁合金)飯盒，內盛新鮮鱸絲，調料備全，為的是現炒了趁熱給我們母女倆享用，因她知道我們沒有條件吃到如此昂貴的菜餚。她的這片愛心，真使我沒齒難忘。在我分配到長樂路公房時，她的高興並不亞於我自己，真像家中的長輩，為我準備窗簾等設備，安排這個新居。後來，我離開上海來美時，她十分不捨得我走，流淚送別。

二、賈循理：他是一位篩網廠的工人，當時40多歲，為人正直。我曾給他做過頷下腺的摘除手術，他一直記在心上。他很欣賞我對病人的態度，哪怕多候診一些時間，也要選擇我治療，並不因別的醫生對我的歧視而輕看我，反而越發尊重我。

他會一點木匠手藝。1979年，崇恩從勞改場回到家中，我們正好剛遷到長樂路分配的公房[註 27]。他主動利用舊木料，親手製作，替我們添置一些小傢俱。每次作工時，他的手都磨得起泡流

血。這種血汗的友情，也是讓我終生難忘的。

三、王恩濟：他是一位工程師。這中間還蘊藏著一個有趣的小故事：那是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，我家逃難到大後方。我就讀於四川樂山縣樂嘉小學，王恩濟是我的數學(算術)老師。幾十年後，我們都在上海工作，但人海茫茫，我們又是如何聯絡上的呢？

真是非常奇妙！有一天，王老師的四弟[註 28]帶著他年邁的母親來我院(華山醫院)內科看病。看完後，他又攙扶著她來看口腔科，正好坐在我的診療椅上。他非常柔和細聲地在母親身旁耳語，那種孝順的神態使我油然而起敬。我心中暗暗地想：“在這個狂風暴雨的時代，竟還有如此孝敬父母的子女！”

隔了幾天，他又攙著他的母親來就診，態度十分謙和地(用一口標準的北京話)問我：“梁醫生，你會到過四川樂山嗎？你在樂嘉小學唸過書嗎？……”使我非常驚訝。我心想：“你怎麼知道我的底細呢？”

他解釋說：“我的哥嫂都教過你書。抗日戰爭時期，我哥嫂剛從武漢大學畢業，……”一下子把我的記憶牽引到孩提時代，回憶起一連串

有趣的往事。他接著說：“我家還保存著你們一班同學的畢業照呢！”

我興奮極了，要求他下次來覆診時帶給我看看。果然，次日他特意送到我的門診室。看了這張已泛黃的照片，一幕幕的童年趣事像電影一般展示在眼前。就是這樣，我和王恩濟(四弟的大哥)老師聯絡上了。當時他再三邀請我去他家作客，也看看他的愛人黃文秀老師，她教過我語文。

可是在那動蕩不安的年代，朝不保夕，尤其像我這樣成份的人，還是少出入為好。所以我一直未與黃老師見上一面。後來才知道，她吞忍不下(文化革命期間遭受的)人身侮辱和攻擊，跳樓自盡了，丟下四個兒女，最小的女兒才 10 歲多一點。

這件事我每想起來就感到無比的遺憾。王老師十分關懷我們母女，他的四弟在我們搬家時，幫我們粉刷房間，是一位非常謙和、善良、有教養的人。

四、蔡祝偉[註 29]：他是一位主內弟兄，也是一位有水平的內科大夫。那時我常在遇事無人商量、走投無路的處境中，他多次推著腳踏車，陪我從醫院走向膠州路家中，邊走邊談。那種關

切之心，真是感人肺腑。我常說：“蔡醫生，你如此之忙，屢次推車送我回家，真使我過意不去。”

他說：“只要爲你解決一個問題[註 30]，我陪送你一百次都在所不惜。”多麼深厚的基督之愛啊！

我的婆婆(崇恩的老母)病重，長期臥床，蔡醫生每日兩次看望，雷打不動，風雨無阻。量血壓、注射、輸液、作心電圖等，所有各樣醫護都是他來操心。料理婆婆的最後，是他代替了婆婆的眾子[註 31]，堅持到淨身送終。

他對我們這個家庭來說，真是恩重如山，我們全家深深地感謝他、敬重他。如今，他全家都移民來美。

蔡醫生有個獨生女，叫蔡紅，是蔡醫生夫婦倆的掌上明珠。她從小敬畏主，不止一次積起父母給她的零用錢，到了一定的數目，就交給崇恩用在聖工上。真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孩子。

當時，有一位愛主的美國姐妹，名叫彭陳盈如，一天突然打電話給崇恩(那時他到美國不久)，說她有負擔幫助一個大陸青年肢體來美深造，問他有沒有合適的人選？

他立刻想到蔡紅[註 25]。彭姐妹就拿出一萬三千美元作經濟擔保，不久蔡紅就來美留學了。其實完全是主的安排，崇恩只不過辦一點經濟擔保手續而已；但這事卻使我們兩家關係更密切了。

五、張慧琴姐妹：在那恐怖氣氛壓得人喘不過氣的年日，家中紅衛兵反覆來抄家(共七次)，又進駐我家七天。聖經及屬靈書等，一切都抄光了，人也癱塌了，禱告也只有嘆息，靈裏枯乾。就在這時，慧琴姐妹常推著自行車陪著我同行在回家的路上，給我一些聖經金句來勉勵我，就像烏鴉叼餅(參王上 17:6)餵養牠的嗷嗷待哺的兒女。如今，慧琴姐妹已安息主懷，我常常懷念她。

六、宋妙萊：他是一位兒童藝術劇院的年輕演員，身強力壯，他的公費醫療關係就在我們醫院。他是個大力士，樂於助人，也極其幽默。有一次，我被自行車撞傷，他用腳踏車推我到醫院治療後返家，如此往返多次。在我們搬家時，我和女兒缺乏勞動力，他一手掌就能托住一台縫紉機。

七、黃伯母、徐家姆媽、阿姨好婆……都

是我在艱難路上分擔我悲愁的拐杖，是神藉著這些善良的人給我許多的愛心和快樂。實在要感謝神的大恩典，一路帶領我經過死蔭的幽谷。

八、無名氏：在有一次診病中遇見一個十分善良柔和的六十歲左右的老太太，她叫什麼我都已經忘卻(因那個姓很少見)。在她的談吐中，我知道她的女婿也被送去勞改了(什麼原因不清楚)。她有一對尚在讀小學的外孫及外孫女，她女兒在教書。診病中不宜多談，於是有一天我按著她給我的地址去看望她，就在安福路上(離醫院很近)。

這也反映了我那時痛苦、孤單的心態，何等可憐！我是那樣急於尋找同病相憐、可以傾心吐意的人。

那天沒有見到她的女兒，但和她交談了許多，心中就覺得舒暢不少。她們一家也是基督徒，但她女婿是因為政治歷史問題而被送去改造的，實在也是無辜的。從此我們也成了好朋友。

[註 24] 在當時，和反革命家屬往來被看作“立場不穩”、“界線未劃清”。

[註 25] 見本書所附照片頁。

[註 26] 下大雨時，街面因下水道的來不及排出而遭淹沒。

[註 27] 這真是神蹟。崇恩改造 21 年多，巧逢改革開放，准予回家探親前一個月，我正好遷居，否則他也無法安身。詳見<十架窄路>。

[註 28] 至今我還不知道他的大名，只隨著孩子們稱他四叔。

[註 29] 見本書所附照片頁。

[註 30] 特指崇恩回滬後的工作等。

[註 31] 那時婆婆的四個兒子在美國，都不便返回上海。

[註 32] 那時我們自己的兩個女兒都還在國內。

七、獨自去安徽軍天湖勞改營探親

1962 年暑假，也是我院工作人員開始每年有休假二週的那一年。我被安排在八月份休假。

我經過尋求禱告，和婆婆商量後，打算去看望崇恩。那時他所在的勞改農場剛從福建遷到安徽[註 33]。於是家人集中大家省下來的糧票買了麵粉，婆婆炒了十幾斤麵粉，拌了白糖、豬油(都是用節省下來的糖票、肉票買的)。把所有的肉票集中，也不足 2 斤肉，炒成肉鬆。有少數主內肢體知道我要去探親，送來壓縮餅乾[註 34]、方片糕及平時儲蓄下來的午餐肉罐頭、炒麵粉等等。這樣集中了家中可吃的、耐放的，整理了一個火油箱、一個旅行袋，總共有 60-70 斤。

8 月 6 日清晨，兩個弟弟(崇架、崇耀)送我到往蕪湖方向的輪船碼頭。弟弟們因為沒有船票，不能進入船艙。碼頭到船艙還有約 200 公尺路，

我只好拚著全身的力氣，一手提一件行李，直達船艙。找到座位、安頓好後，我默默求主為我安排一個好的幫手，下船時可幫我一把。“不讓我遇見試探，救我脫離兇惡(太 6:13)，千萬不要碰上壞人。這許多食物來之不易，是家人牙縫裏省下來的，求主幫助我。”

在船上要有七、八個小時，主給我看中兩個年輕力壯的男孩，另有一個女孩，都是學生模樣，就在我旁邊。我就試著和他們搭訕，嘯長問短，知道他們的家就在蕪湖。漸漸熟悉起來，我給他們幾粒糖果，越談越融洽。我直覺中他們不是壞人，是單純的學生。我表示到岸後需要他們的幫助，他們欣然答應。

傍晚時，汽笛鳴了，廣播員告訴乘客，蕪湖到了，輪船即刻靠岸。我把行李整好，排隊準備下船。他們是學生，沒有什麼行李，很殷勤有禮貌地把我的兩件行李安放在岸上。我人地生疏，他們告訴我，附近不遠有一家旅社，並替我僱了一輛三輪車，運到旅社門口。

我定了房間，是好幾個人一間的。過了不久，這幾個孩子又來旅社看我，似乎與我有一點緣分，是主差遣他們來保護我、關心我的。當晚

我徹夜未眠，看守著這兩件“無價之寶”。

次日一早，兩個男孩子竟又來幫助我，僱三輪車把我和行李一併送到長途汽車站(他們隨後乘公車趕來)。排隊等候，直等到午後汽車才啟動。他們分明是主差派來的。我和孩子們揮手告別，多謝他們熱心幫助，更感謝主差派天使來幫助無助的人。祂是何等貼心、周到！

坐上往宣城去的長途汽車，黃土公路塵土四起。到天黑點燈時分才抵達宣城。這裏不像蕪湖熱鬧喧嘩，只是一個小鎮。因天黑了，路人稀少，沒有正規的馬路，只見高低不平的土坡路，周圍還有田埂。我站在小坡路上，舉目無親，不知何往。四處稀稀散散的土坯[註 35]、破瓦房及茅竹房均有；我沒有看見任何的交通工具，也許是太晚了。

我求主讓我能找到一個旅館暫宿一夜。就在此刻，我看見一個挑擔的老人[註 36]進入一個半開門的房子裏。我提著行李跟著他去，才知這個房子就是宣城的客棧。我走進去，要先在門房(傳達室)登記姓名、從何處來、往何處去等等。我如實一一登記，老闆一看我的去向——軍天湖(勞改)農場，就一清二楚了。

那一夜，我更是徹醒地守住這即將到位的救命食糧，又加鄉間蚊子特多，也咬得無法入睡。

不等天亮，我就梳洗結賬，然後將這兩件行李拎到客棧門口。一出門，見路兩旁陳設了許多新鮮菜蔬等農產品，人也漸漸多起來。

我站在門口，又等待著主下一步的引領和預備，因我對去向摸不著頭腦，也無車，也無人詢問。近的地方，還可拼著一股力，走一段，停一停；可是聽說過到勞改營還有 20 華里[註 37]路啊！

正在此時，那位昨晚挑擔的老人挑著擔子走出客棧來了。

我問他：“老伯伯，您到什麼地方？”

他答：“去農場看兒子。”

“是哪一個方向？是否往軍天湖農場？”

“是軍天湖農場。”

我真高興，但卻發現他兒子和崇恩不在一個分場。我請求他：“可否幫我一個忙，帶我一段路？帶到分岔路口，您就把行李放下，我自己再想辦法。”

老人看我一個弱女子拿這麼重的東西，十分同情，便欣然答應。

我跟他後面，連走帶跑地跟了一段路程，他就停下來了。我送了他一包煙[註 38]表示感謝。

於是我又站在路邊大樹下黃土公路旁等候。此時我還來不及求主(賽 65:24)，就有一輛敞蓬卡車遠遠駛來。我向他們招手，盼望能得到幫助。他們果然停下，我將要求告訴他們。感謝主的眷顧，他們沒有拒絕，讓我上車，但也只能帶上一段路，不能帶我到目的地，因他們另有任務。

到了分岔口，我又得跳下車，送了他們兩個人一點香煙表示感激。

我站在路旁默默求告主：“主啊！我相信我已很靠近目的地了，需要你親自引領我。我既無方向，又無交通工具。求你幫助我！”

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我抬頭看見兩個彪形大漢抬著一個木箱，從不太遠的地方向我走近。我就問他們：“你們到何處去？”

他們說：“我們去下灣分場三隊[註 39]”。

我心中一亮，就問：“你們認識俞崇恩嗎？”

他們那種表情，好像是與他太熟悉了：“他就和我倆住在一個地方。”

我懇求他們把這兩件行李放在他們抬的木櫃[註 40]上，我跟在後面走，一同到他們隊裏。他們滿口答應，表現出十分樂意幫助。於是我跟在他們後面，簡直是半跑步才能趕上。鄉間沒有正規的路，經過數不清的高高低低的小丘、田埂，直到正午才抵達。

他倆遠遠就風趣地大呼大喊：“老俞，你的愛人來看你了！”

崇恩事先沒收到我的來信[註 41]，對這突如其來的呼喚感到懷疑。一直等他抬頭看見我們家中那隻他所熟悉的塗過綠漆的火油箱，才敢相信。他即刻去刮鬍梳洗迎見，真是悲喜交集。

他們的領導對我這個屬於人民身份的人還是比較客氣(人道)的，介紹我到附近一戶農家住下，並端來一小碗醬黃豆和一大碗米飯，請我吃中飯。

我由於幾天路上的折騰，疲累至極，一點胃口也沒有。我說：“不要吃。”

可是在旁邊饑腸轆轆的崇恩連說：“要的！要的！”

過後，他狼吞虎嚥地吃了個精光。

隊長表面上似乎是款待我，特准崇恩可以向

老鄉買一隻雞讓我煮來吃，其實是有心給崇恩增加點營養[註 42]。

也不知是誰替我們把雞殺掉，我急忙拔毛後，就將雞投入灶頭上大鐵鍋內，加水，添柴火燒煮，完全忘了要先將雞破腹清洗。另一個原因是我在城市只吃食堂，從不會做廚房工作。這下鬧了一場大笑話——就這樣，我們將一隻未破腹、又無作料(除鹽外)的全雞吃了，還吃得津津有味，真是一件終生難忘的無知傻事。

在農家住了一夜，和老大娘擠在一張大床上。她打呼，天又熱，蚊子咬，好不容易熬到天亮。我決定馬上返回歸途。那裏荒野田埂，偶有狼、獾等野獸出沒。崇恩不放心我一人獨行，向領導請假，未能批准。但他寧可回來挨批評，也一定要送我一程。

離開農場不久，我們在路攤上吃了一頓麵條，又急急上路。遇到溪水，他揹我過去。一直走到午後，才抵達宣城車站。買好車票，不等我上車，他就急忙轉身回隊。

我順利地坐上汽車，傍晚抵達蕪湖，找到火車站，買上當晚回上海的火車票，歸心似箭，因為所帶包袱都已卸下，一身輕地坐上火車。此刻

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恩。由於太累了，心也平靜了，在座位上好像打了一個盹，已是次日天朦朧亮，火車已到上海北站，我又回到我熟悉的地方。

這一次的探親雖然只有三天的時間(8月69日)，卻被我科室內的同事發覺。她們發現我暴露在外面的手臂和小腿部分有陽光留下的分界線，又加上曾有一位特別要好的高醫生，曾來我家給我送醫院裏配給的幾條小帶魚，家人未明確地告訴她我的去向，使她產生疑惑。於是到了文革時，要我交代這一段時間沒有劃清界線的思想和行爲，狠狠地批鬥了我一頓。

文革時期，工宣隊、軍宣隊進駐我院，給我們這些專政對象不斷地施加壓力。針對我而言，就是要我與丈夫劃清界線。他們勸導我：“爲了孩子們的前程，爲了你本人的幸福，你還年輕，又有如此好的職業……”等等，總之軟硬兼施，要達到逼我離婚的目的。

我的確很愛兩個孩子，爲了不讓她們跟著我長期痛苦，我思想上也有過波動。但我裏面聖靈的責備使我不得安寧。我向他們表態：“我不會離婚。我的良心不允許我這樣做，雖然我會痛苦

一輩子。”

這樣表態後，我深處重新回到平安裏(西3:15)。

[註 33] 詳見<十架窄路>第一部份“十字架和苦難”第四、第五分段。

[註 34] 軍用多餘轉民用。

[註 35] 稀泥經木模成形後曬乾代替磚頭用作農村土房建材。

[註 36] 50 多歲，還不算老；但因農民辛苦勞作，面容蒼老，加上鄉間喜用“老”字，以示尊敬，故後面稱他“老伯伯”。

[註 37] 等於 10 公里。

[註 38] 當時的風俗如此；我是在上海就做好準備的。

[註 39] 可能那地方已經是軍天湖了，因鄉間無路牌，而且剛遷場兩個月，一切都未上軌道。

[註 40] 後來知道這木櫃是勞改隊的空檔案櫃。

[註 41] 當時宣城縣因三年自然災害死了許多人，郵局尚未恢復。

[註 42] 在那個年代，就是我們城市居民也難吃到活殺雞。

八、文革時隔離審查

那是 1968 年 7 月 8 日，禮拜一。白天我還在正常地看門診，一點沒有察覺到將有大禍臨頭。忽然在下午快下班時，造反派[註 43]宣佈晚上在大禮堂開群眾大會。晚飯後，各科室整隊入場，氣氛異常恐怖緊張。我科室坐在第一排。

會場坐定後，造反派頭頭趙偉鵬氣勢洶洶地

跳上講台，宣佈當晚大會要揭發反革命份子的罪行。當他唸到我的名字時，他們把我拎到台上。

我陷入一種麻木狀態，不知道他們揭發的是我？非我？許多事我簡直聽不懂——

“她家中裝有電台！她收聽敵台，與台灣聯絡、提供情報……”

“她是根深蒂固的反革命教徒！”

“她的丈夫是徹頭徹尾的披著宗教外衣的反革命骨幹份子！”

“她的公公……”

“她的小叔……”

“她的父母兄弟解放前夕潛逃到台灣……”

我的一系列“罪狀”被揭發出來。那晚共揭發批鬥了三、四位；別人的“罪行”我一點也沒聽進去。

接下來，會場裏大呼口號：“打倒！”“革命無罪！”“造反有理！”……喧嘩一片。

接著從台上下來幾個造反派幹將，把我們這些被揪出來的人押送到各間隔離室內，把門從外面反鎖起來。

室內空空，僅有一個塌塌米及一張學生上課

用椅。窗子都用鐵絲網密密紮好；反鎖的門上有一塊似小手帕大小的小窗口，用一塊布遮在外面，供監視我們的人透過這小窗口窺視我們一切的行動。整個格局十分恐怖，真像牢房一般。

當晚我徹夜未眠。我坐在塌塌米上，想著每晚路備(那時她 12 歲)都要等我回家才睡覺。此刻已經半夜了，她不知睡了沒有？奶奶(我婆婆)在大房間早已就寢了。路備一個人在閣樓裏，等得不要害怕嗎？

第二天一大早，奶奶拎著一包蘋果來看我。她走到門診部，遇見內科諸君龍大夫[註 44]。他穿著白大褂穿馬路過來。奶奶向他問到我，他說：“老太太，你不必去看梁醫生了。”就將前一晚的情況告訴了她。奶奶只好失望地拎著蘋果回家。

以後我得知，那晚路備一直等我到午夜 12 點以後，不見媽媽回來，只得睡了。清晨她發覺對面小床上整整齊齊，意味著母親昨夜沒有回來。……

七月的上海十分炎熱。我被關在這悶葫蘆裏，簡直熱壞了。沒有洗澡的自由，只穿著一套夏天的衣褲，都要發臭了。直到 7 月 12 日關進去

第五天了，也就是禮拜五了，我向監督者要求請家人給我送點盥洗用俱及換洗衣服來。監督員請示造反派，他們才派人來。

我除了將我需要的日用品列在紙上外，還提醒女兒不要忘了煮綠豆湯喝。因為在關押前的 7 月 6 日，正是發工資的日子。7 月 7 日是禮拜天，我帶著女兒將夏季糧店特別分配的一小包綠豆(平常沒有的)買好，放在火油筒[註 45]內。我怕女兒忘記，特地在紙條上附了一句。

結果這幾個去我家的造反派隊員就在這句話上大做文章，懷疑我有什麼暗語——“這句話裏有什麼反革命勾當？”

於是到了我家(膠州路)，就在這個火油箱內僅一飯碗容量的綠豆裏，反覆搜尋，並逼我孩子給我寫一張紙條，要我好好交代.....。

我看了造反派帶回來的這幾行字，心都碎了，情不自禁流淚滾滾。和我朝夕相依相伴的孩子，她難道不瞭解她的母親嗎?!母親所說所行，她再清楚不過了。她母親難道是壞人嗎?是反革命嗎?母親勤勤懇懇地早出晚歸，整個的心都擺在她一生執著的事業和她的兩個孩子身上，諄諄教導她們要做誠誠實實的孩子，好好學習，天天

向上.....。

我心傷痛極了，但我也深深知道，路備非常敬愛她的母親，瞭解母親的行事為人。那紙條上的字句，絕不是一個 12 歲的孩子以命令的口氣向母親說的。這不是她平日的態度，是造反派強逼她這樣做的。我想，她自己一定也難過極了。

大禮堂就座落在隔離室的南邊，一有大會批鬥，鑼鼓喧鬧，我在隔離室內就心驚肉跳。一聽到跑上跑下的樓梯腳步聲，就嚇得捏著一把冷汗，不知今晚是否又要批鬥我，或是被拉去陪鬥。

我最難忘的一次大概是 1968 年 12 月的一個清晨，那時職工們還未正式上班。一陣強烈的喧嘩——矛棍擊打聲——逐漸地逼近隔離室方向，並有鋼鍊、鐵棒的敲打聲，哄上樓來。

紅衛兵[註 46]們強迫監管值班人員打開每一間隔離室。

這天監管值班的是一位男護士，叫張妙林。他很有智慧，也有魄力。他說：“我未得到院方指示，不能擅自開鎖。”

這些紅衛兵嚷鬧了一陣，未能得逞；不然我們這些專政對象非被他們打得頭破血流，身體遭

受慘重傷害不可，甚至一命嗚呼。他們亂鬧了一陣，不斷地高呼“革命無罪！”“造反有理！”的口號，走出了醫院大門，到其它地方武鬥去了。

我是個膽小的人，躲在隔離室的角落裏，在心的深處不住地求告主(詩 81:1 上)；但仍心驚肉跳，久久不得控制。如今回想起來，仍然顫栗，因為在那時他們這些所謂的“革命小將”打死所謂的“反革命份子”也是“有理”的。

我在這間隔離室裏關了整整七個月，從炎夏經過寒冬。剛開始第一個月，每天早上造反派都派人來收取交代材料。他們態度極其惡劣、粗暴，用威脅的言語恐嚇我。幾天過去了，我實在交代不出什麼，重重覆覆，再寫一遍。

一個禮拜以後，他們就不再來收材料了，卻又逼我們從早到晚閱讀<毛選>14 卷，背誦毛主席語錄。他們不允許我們讀任何其它書籍報刊，就是上廁所也要向管理員請示。

我深深體會到失去自由的痛苦。我常常立在門旁，每當風吹飄起小窗上的遮布，我就從縫隙間窺見往日自己走過的地方。如今同事們走來走去，有的忙著工作，有的端著臉盆去洗澡。那

時，就是洗澡也令我羨慕不已。將近半年了，我還沒有洗過一次澡。看著外面，也會聯想到往日我常經過的靜安寺，該怎樣了？……。深深地感到自由也是一大幸福。

記得有一次吃“憶苦思甜”[註 47]飯，每人晚餐是兩隻糠皮苦菜窩窩頭。革命群眾可以多吃或少吃，象徵性地表示一下就行；而對待我們所謂的專政對象，卻強迫性地要全部吃到肚子裏，旁邊有人監視著。窩窩頭過於粗糙，我喉嚨裏通不過、嚥不下，只得用水像服藥般地一口口吞下。好不容易吞到最後一口，然而胃不接納，反胃，全部嘔吐出來，那晚等於餓了一頓。

原本伙食就差，工資再被扣去三分之一，我還要負擔家用，自己所剩無幾，只得十分節約著使用，每月僅人民幣 6-7 元伙食費。

當我被隔離後，奶奶(我婆婆)就寫信告訴崇恩，隱約地說我“住院”了。他明白了一切，我們失去聯繫，不能通信。

那時市面上最流行的就是<毛主席詩詞>，只有這樣的小冊子才可以郵寄。就在我剛關進隔離室兩個月左右，即心靈最痛苦、靈裏最下沉的時候，忽然收到看守員遞給我的一卷油印手冊。打

開來翻到最後一頁，見有幾個崇恩的親筆字跡：

一九六八年九月晚九時

我眼前一亮，這句話帶給我靈裏極大的鼓勵、幫助和深深的思念。我熱淚盈眶這是我們曾訂的默契：九時，正是我們彼此代禱、思念的時刻。

文革以後，這幢小樓房(文革時的隔離室)經過裝修，成了“十二病房”即高幹病房[註 48]。我平反後，恢復原職，有時到這個病房來會診，就很自然地觸景生情，想起那段煎熬的日子，不禁感嘆萬千！

[註 43] 由院內的[註 43]造反醫生組織起來的。

[註 44] 他原來可能也是基督徒，但那時已不敢承認了。

[註 45] 從前裝火油的馬口鐵箱。

[註 46] 紅衛兵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中學生，又稱“紅衛兵革命小將”。

[註 47] 即“憶舊社會之苦，思新社會之甜”。

[註 48] 專為十三級以上幹部住的病房。

九、平反點滴

約在 1977 或 1978 年，我已記不清了。總之那暗無天日的“十年浩劫”[註 49]大風暴已經結束，全國各行各業都逐漸步入正軌。我們上海醫

科大學及各附屬醫院，醫、護、工也都恢復到應站的崗位上[註 50]，醫、教、研也竭力地趕上去，因為被“蝗蟲吃去”的時間太多了。

醫院裏也和社會上一樣，冤、假、錯案存在太多。爲了振奮人心，引人積極向前(所謂的“向前看”)，就必須先將冤、假、錯案糾正平反。對於我們這一群知識分子的平反大會，上海醫科大學開過幾次；但最讓我難以忘懷的，是一次在華山醫院召開的平反座談會。

一天下午，新來的院黨委書記高敏召集我院幾位文革中受迫害或隔離過的醫生，還有兩、三位黨政幹部參加。在一間不大不小的會議室裏，大家圍繞一張長形會議桌坐著，要我們各自發言“吐苦水”。

我頂記得內分泌大夫 Z 醫生[註 51]的見證—

Z 醫生和她在上醫同窗六年的丈夫 W 醫生感情深厚，生活美滿，育有一對可愛的兒女。就在文革期間，W 醫生在一次與朋友們的交談中，無意中論到江青[註 52]的一些過去，結果被人上報領導，就此判刑 12 年，送到上海提籃橋監獄。

從此，年輕的 Z 醫生十分痛苦，拿著微薄的

薪水支撐著這個家庭，肩負著孩子們的生活及教育費用；生活過得很清苦，常以鹹菜、大餅充饑。每個月可探監一次，她總是節省下來一些食品，給 W 醫生送去他喜愛吃的，關心著他的夏熱冬寒。

然而，整個大環境的惡劣、社會上的輿論、同事朋友的勸導、年老父親的關切、經濟上的重壓，使她喘不過氣來。幾十個不眠之夜，為著孩子們的前途、她自己的事業等等，經過反覆痛苦的思想鬥爭，她最後終於被迫選擇了離婚之路。

在一次冬日探監時，她將 W 醫生春夏秋冬的衣著用品整整齊齊地理好，交在 W 醫生手中，把自己的意念和選擇心平氣和、無奈地陳述在他面前。W 醫生通情達理，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情和處境，知道她提出離婚實在是迫不得已的。W 醫生為了妻兒的前途，同意她提出離婚，很快地辦完離婚手續。可是，這一段雙方內心的傷痛經歷，卻是終身難忘的。

過了不到一年，Z 大夫經人介紹，認識了社會科學院一位研究員 C 先生，兩人很快就結婚了。當然，Z 醫生生活上為難的一切都得到了改善，C 先生對孩子們也十分疼愛，視為己出；對 Z 醫生

也很體貼。由於 Z 醫生的醫、教、研任務繁忙，C 先生相比之下空一些，因此家裏一切家務(買、洗、燒)都由他肩負料理。他說：“我自願替 Z 醫生做一塊鋪路石。”生活過得很不錯。

然而時日不久，“四人幫”被打倒，W 醫生刑期未過一半(3-4 年)就無罪釋放，重新安排醫生工作，恢復原職原薪。

此時此刻，可以想像 Z 醫生內心是何等痛苦！何等的錯綜複雜！雖然 C 先生願意犧牲自己，讓他們破鏡重圓，但是在 Z 醫生的心中，她不能做如此違背良心的決定。她與 C 已正式結婚，C 一直盡心竭力地體諒她、照顧她，沒有對不起她的地方。W 醫生雖然是 Z 醫生的原配，是孩子們的生父，然而二人卻已辦了離婚手續。

面對這個局面，Z 醫生如何才能妥善處理？實在萬分矛盾、萬難至極，又一次陷入另一種痛苦境地。她日夜難眠，左思右慮。她讓孩子們常去看望孤單的父親，她自己卻以不去為妥。直到最後，Z 醫生將自己最知己、最貼心的女朋友介紹給 W 醫生。他們成了一對美滿的眷屬，Z 醫生在良心上才勉強平靜下來。

文革中像這一類家破人亡、妻離子散的悲

劇，比比皆是。但感謝主！在祂敬虔的兒女中，卻有一些家庭蒙主的保守。他們尊主名為聖，不敢違背主關於尊重婚姻的教導；雖然歷經長期沉重的政治壓力和經濟拮据、貧困，主還是保守帶領他們過來。對於敬畏祂的人，祂的恩典是夠用的，並沒有人所不能忍受的試煉(林前 10:13)。

[註 49] 回顧所謂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”，報上稱之為“十年浩劫”。

[註 50] 即文革期間護士或工友進手術室主刀、醫生打掃廁所衛生之類的事，到此時已中止。

[註 51] 已移民美國，現在紐約。

[註 52] 毛澤東第三任妻子，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前，曾在上海作電影演員。

寫在後面

在我流放改造的 21 年(1958-1979)漫長的暗無天日的歲月中，尙仁經受了來自各方裏裏外外的壓力、欺侮和歧視，一直在萬般無奈、經常受氣、吃虧之中。要不是主的憐憫扶持，實在無法忍受到底。但是主的話說：“爲什麼不情願受欺呢？爲什麼不情願吃虧呢？”主耶穌還親口說：“我父所給我的那杯(指十架苦杯)我豈可不喝呢？”(約 18:11)榮耀的主尙且如此，何況我們

呢？

我們是父神所愛的，且是愛到極處的。父神愛我們如同愛主一樣(約 17:23 下)！我們自出娘胎，直到年老，都在祂懷抱中(賽 46:3-4)。21 年的死蔭幽谷的歲月，也在祂慈愛的懷抱中；祂的寶座是永存的，祂的權柄統管萬有(詩 103:19)。祂掌握公雞的啼叫(路 22:54-62)，我們的頭髮都是祂數過、編過號的，我們所受的苦是祂量過的。祂應許不會超過我們所能忍受的(林前 10:13; 參腓 4:6-7)。主何等信實！像尚仁這樣一個軟弱的肢體，祂揹著、抱著經過驚濤駭浪。

願榮耀都歸給祂，直到永永遠遠！

倚靠耶和華，以耶和華為可靠的，那人有福了！他必像樹栽於水旁，在河邊扎根；炎熱來到，並不懼怕，葉子仍必青翠；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，而且結果不止。(耶 17:7-8)

俞崇恩

本書源起

自從 1997 年俞崇恩弟兄的《十架窄路》問世以來，許多讀者在深受感動之餘，切盼進一步瞭解在那狂風暴雨的歲月中，他的妻子是如何蒙主恩帶領過來的。

如今在他倆結婚五十週年之際，我們把尚仁姊妹簡略的見證與大家分享，歡迎指正，並敬請讀者代禱：求主保守、引領他們餘下的年日，直到見主的面。